

【專號論文】 Feature Article

DOI: 10.6163/TJEAS.201906_16(1).0002

江戶日本人建立「日式區域秩序」的設想—— 以近松門左衛門、佐藤信淵、吉田松陰為中心

The Conceptions of Establishing Japanese-Style
Regional Order in Edo Japan: Centered on
Chikamatsu Monzaemon, Satō Nobuhiro and
Yoshida Shōin[§]

董灝智

DONG Haozhi*

關鍵詞：日本、江戶、近松門左衛門、佐藤信淵、吉田松陰、日式區域秩序、侵佔中國、構想

Keywords: Japan, Edo period, Chikamatsu Monzaemon, Satō Nobuhiro, Yoshida Shōin, Japanese-style Regional Order, Invading China, Conceptions

§ 本文係2019年度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一般項目「江戶日本的日式區域秩序構想研究」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 東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教授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摘要

豐臣秀吉發動的「侵朝征明」的壬辰戰爭最終以失敗告終，這不只意味著日本試圖通過武力方式構建區域秩序行動的失敗，更直接促使後繼者德川家康採取了保守型的對外策略。雖然，江戶幕府成立伊始即放棄了對外擴張的行動，但江戶日本人卻從未放棄擊敗中國進而建立以日本為主導的區域秩序的「夢想」，尤其是當日本的外部局勢發生變動之時，江戶學者便緊接著設計出吞併周邊國家以及武力侵略中國的「構想」，因為只有在軍事上擊敗中國，才能實現日式區域秩序的建立。即使這一思想不是江戶思想的主流，卻明顯地間接影響了明治日本的對外擴張政策。因此，本文以十七世紀中期的「明清鼎革」、十八世紀前期的「西方滲透」和十九世紀中期的「培里來航」三個時段為歷史背景，以近松門左衛門的《國姓爺合戰》、佐藤信淵的「宇內混同說」和吉田松陰的「對外擴張論」為中心，解讀他們的日本對外擴張（主要是針對中國）「構想」。這意味著，對於明治日本對外擴張及侵佔中國思想的研究，不能只局限於近代日本的視角，更不應忽視近代之前的研究視域。

Abstract

The Imjin War (1592-1598) launched by Toyotomi Hideyoshi ended in failure. Not only did it mean the failure of Japan's attempt in constructing regional order by force, but also it resulted in Tokugawa Ieyasu's conservative foreign policy strategy. Although the Edo Bakufu gave up its outward expansion at the beginning of its establishment, some Edo Japanese never stopped "dreaming" of defeating China and establishing a Japan-dominated regional order. Especially when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changed, Edo scholars always responded with proposals to invade neighboring countries and China. Only if China was defeated militarily, was Japanese regional order established. Even if the idea was not the mainstream of Edo thought, it indirectly affected Meiji Japan's policy on foreign expansion. This article thus attempts to interpret the conceptions of Japan's expansion towards China. The scope of the research is across three periods including the "Ming-Qing Change Era" in the mid-17th century, the "Western Infiltration" in the early 18th century, and the "Matthew C. Perry's Expedition to Japan" in the mid-19th century. My discussion focuses on Chikamatsu Monzaemon's "The Battles of Coxinga", Satō Nobuhiro's "Secret Strategy for Expansion", and Yoshida Shōin's "External Expansion Theory". I intend to argue that research on Meiji Japan's outward expansion and its invasion to China cannot confine its discussions to the perspective of modern Japan and should not overlook discourses in pre-modern Japan.

壹、前言

在十九世紀中期西方武力衝擊之前，東亞地區曾長期存在過某種以中國大陸政權為核心的「區域形態」，它發軔於先秦，成型於漢，完善於唐，鼎盛於明，衰落於清，伴隨著中原王朝的版圖與勢力範圍的擴大，其輻射區域亦隨之伸展至朝鮮、越南、日本等國。這一「區域形態」表現形式可表述為：政治上的「宗藩關係」、經濟上的「封貢關係」和文化上的「華夷關係」，¹而與之相表裏的則是，中國王朝在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層面相較於周邊屬國均位處優勢，並凸顯出中外間鮮明的政治落差、經濟落差和文化落差。政治落差與經濟落差或可作一體觀瞻，即政治、軍事、經濟等綜合實力上的地位差等。文化落差源自於文化差異，直接表現在衣食住行等生活方式上。然而，當早期中華世界與周邊諸國、夷狄間的政治落差逐漸趨平甚至出現了逆轉時，春秋戰國時期的中原人士則採用了加大「文化落差」的作法來彌補現實中的「政治落差」。孟子（372-289 BCE）的「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等「華夷觀」表述正得其旨。這既是周代禮樂文明高度發達的又一表現形式，又體現了儒學華夷觀的主體內涵，更是秦漢以後「華夷之辨」思想的核心原則。同時，中國王朝在政治、文化等方面對「四夷」影響日益增大的同時，「變夷為華」的意識也在「四夷」的身上逐漸發酵。也就是說，中國王朝用「禮教式的天下秩序」將周邊屬國、部族納入其中後，也同時提供了後者與前者爭奪「正統」地位的方式與方法。當周邊屬國的政治、經濟及軍事實力超過中國王朝時，便會效法這一「天下秩序」的展開邏輯，將自身塑造為正統的代表者，並通過朝貢、冊封的手段以樹立其權威性。

西元一世紀前後，日本雖以朝貢者的身份融入以中國王朝為中心的區域體系中，並接受中國王朝的冊封，但卻長期被中國王朝視為「夷狄」。²

1 韓東育：《從「請封」到「自封」：日本中世以來「自中心化」之行動過程》（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6年），頁127-128。

2 據《後漢書·東夷列傳》所載：「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國奉貢朝賀，使人自稱大夫，倭國之極南界也。光武賜以印綬。」〔南朝宋〕范曄：《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

然而，當其政治勢力積累到一定程度時，便試圖擺脫其被冊封的身份，力爭取得與中國王朝平等的地位，甚至不惜採取軍事手段與中國王朝一爭高下，以扭轉中日之間的政治落差。所以，從五世紀至七世紀，先後發生的倭五王的「請封」與「自封」、隋倭國書事件以及白江口之戰（中文學界稱「白村江之戰」），皆是日本扭轉中日間政治落差的嘗試。白江口之戰雖以日本一方的失敗而告終，但卻是中日兩國歷史上第一次正面的軍事衝突，對東亞地區影響深遠。首先，進一步鞏固了以中國為中心的東亞區域秩序；其次，新羅統一了朝鮮半島南部，結束了分裂局面；最後，日本的勢力退出朝鮮半島，一千餘年內再未進犯，但日本卻從未放棄侵略朝鮮的野心。³不甯唯是，白江口之戰更是日本扭轉中日間落差的一次軍事嘗試。試想，日本如果不自認為自己的實力達到一定程度，豈能貿然出兵相助百濟而對抗大唐？表面上看，日本的戰敗僅是小規模的損失，但事實上卻是失去了大化改新以來的國家自信心，誠如有學者所言：「白江口一敗，顛覆了源自根底的國民自負自尊的信念。」⁴即使是在一九三〇年的日本人著作中，仍視「白江口之戰」為重大失敗，認為日本的國防政策也為之一變：

今日之見，白江口之戰可訓戒之處多矣〔……〕此海戰中海軍的戰敗，全然失墜國威於大陸〔……〕以至於不得不舍去朝鮮〔……〕白江口海戰的結果，我國完全放棄積極政策的同時，圍繞著國防問題，純然變為防禦的態度〔……〕。⁵

言外之意，古代日本的「大陸政策」也隨之破滅。

1965年），卷75，〈東夷列傳〉，頁2821。這是目前中國正史中首次關於日本接受中國王朝冊封的記載。繼之，又有魏明帝詔賜女王卑彌呼為「親魏倭王」之事。此後，中國王朝對日本的主要認識是東夷之一，《漢書》、《三國志》、《宋書》、《南史》、《隋書》、《新唐書》、《宋史》、《明史》等正史中稱日本為倭、倭人、倭國、日本等，為表述一致，本文均以日本稱之，有特殊之處會專門指出。

3 董灝智：〈五至九世紀日本構建區域秩序的嘗試〉，《世界歷史》，2017年第1期（2017年2月），頁84-93。

4 衣斐鈺吉：《東亞の形勢と日本の将来》，上卷（京都：立命館大學出版部，1926年），頁39。

5 三笠保存會（編）：《大日本海軍戰史談》（東京：三笠保存會，1930年），頁12-15。

白江口之戰的失敗更使日本認識到自身難以與中國王朝抗衡，因而，虛心向中國學習，派遣遣唐使、留學生來中國。對此，有學者稱：「自白村江之役，唐高宗大敗日本後，患畏唐病之日人，愈崇拜景仰我國之文化，故遣唐使與留學生等之派遣，極達最盛時代。」⁶據載，有唐一代，先後任命遣唐使達十八、九次。⁷其中，三分之二的遣唐使是在白江口戰役後派遣的，每次人數幾十人到數百人不等，中日之間的文化交流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直至八九四年（唐乾寧元年、日本寬平六年）日本廢止遣唐使。對於其原因的探討學界仍未停止。其中，日本學者森克己（1903-1981）的解釋較為合理，即日本難以承擔遣唐使高昂的費用及唐日商人的民間活動取代了兩國之間的政治往來。⁸這也從另一側面解釋了此後五百餘年間中日兩國「政冷經熱」的狀況。兩國雖無邦交往來，但民間的經濟、文化交往卻極為繁盛，雙方均獲利巨甚，即便是元朝曾有過兩次征日的軍事行動，但其後並未影響兩國間的民間交往。

此後，日本第二次軍事挑戰中日政治落差的行動，則是豐臣秀吉（1537-1598）發動的「壬辰倭亂」（1592-1598），這對以中國王朝為核心的區域秩序，無疑構成了新一輪的破壞。關於這場戰爭爆發的原因，在江戶時代至少有林羅山（1583-1657）與中井竹山（1730-1804）的「功名說」、貝原益軒（1630-1714）的「好戰說」、安積澹泊（1656-1738）的「侈心說」、賴山陽（1781-1832）的「動亂轉移說」，至近代則又有「通商貿易說」、「信長意志繼承說」、「朝鮮無視國際禮儀說」等不同表述。⁹若以朱元璋（1328-1398）的「十五不征之國」範圍印證之，則豐臣秀吉的戰略計畫與中國王朝中心的區域體系已具有某種空間上的一致性，即先伐朝鮮、次征明朝、再征印度，進而取代中國王朝在這一區域的核心地位。重要的是，這種試圖扭轉中日之間的政治落差的舉動，既不同於白江口之戰時日本對朝鮮半島的侵略，也不同於「日式區域」的建構野心，而是將打擊的對象直指中國王朝，這在日本歷史上尚屬首次。為此，秀吉在

6 王輯五：《中國日本交通史》（上海：上海書店，1996年），頁59。

7 武安隆：《遣唐使》（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頁31。

8 森克己：《遣唐使》（東京：至文堂，1955年）。

9 德富豬一郎：《近世日本國民史：豐臣氏時代·丁篇·朝鮮役·上卷》（東京：民友社，1935年），頁113-124。

軍事上作了充分的準備，在短期內集結水陸軍十六萬餘人，¹⁰企圖一舉攻佔朝鮮與中國，結果被中朝聯軍阻止，秀吉的野心亦隨之破滅。

鑒於豐臣秀吉對外戰爭的失敗，德川家康（1543-1616）建立德川幕府（1603-1867）之後，一改秀吉強硬的對外政策，不僅率先恢復了日本和朝鮮的國交，還主動遣使赴明試圖恢復與明朝的往來。¹¹同時，對西洋諸國亦採取寬容的政策，允許其通商與傳教。然而，由於基督教的盛行危及了幕府的統治，迫使德川幕府在一六三三年至一六四一年間先後五次頒佈鎖國令，正式確立了德川幕府的對外政策。¹²是故，有學者稱豐臣秀吉的日本類型為「大日本」，而德川家康的日本類型則為「小日本」。¹³此亦表明日本已無力從政治、軍事等層面來繼續扭轉中日之間的明顯落差。德川家康固然借助了中國的朱子學來穩固其政治秩序，但朱子學中的「華夷之辨」在德川日本卻仍是一個難以逾越的話題，即便其中不乏「諸夏用夷禮則夷之，夷狄用諸夏禮則諸夏之」的轉換暗示，但日本的政治、文化實力難與中國抗衡，卻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就是說，按照「前近代」東亞世界的展開邏輯，扭轉「文化落差」似乎也只能是江戶日本的唯一選擇。重要的是，在明清鼎革的刺激下，江戶日本人不但開啟了「變夷為華」思想的建構之路，更在這一過程中不時地凸顯出日本建立日式區域秩序的構想，詳細地設計了侵佔朝鮮及中國的計畫，而這一構想恰是江戶之前日本通過軍事行動未曾實現的計畫，更甚深地影響了幕末—明治日本的對外擴張政策。

目前學界關於近松門左衛門（1652-1724）、佐藤信淵（1769-1850）和

10 西龜正夫：《織田豐臣時代》（東京：厚生閣書店，1936年），頁109-110。

11 瀨野馬熊：《朝鮮史大系·近世史》（東京：朝鮮史學會，1927年），頁169-172。

12 長期以來，江戶日本實施「鎖國」的原因一直是中日學界關注的重點問題。武田萬里子將日本學界的研究成果總結為：（1）基督教禁制說；（2）金銀銅的海外流失抑制說；（3）商業資本的抑制說；（4）大名資本的抑制說；（5）絲割符仲間的策動說；（6）荷蘭的對日貿易獨佔策動說；（7）幕府權力的強化確立說。參見氏著：《鎖国と国境の成立》（東京：同成社，2005年）頁3-4。這意味著，江戶日本之所以採取「鎖國」政策雖是多方面的因素促成的，但「基督教禁制說」則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國內外學界的多數學者對這一點持贊同態度。

13 船曳建夫：《右であれ左であれ、わが祖国日本》（東京：PHP研究所，2007年），頁48。

吉田松陰（1830-1859）的個案研究較為豐富，內容涉及到政治、思想、軍事等諸多方面，尤其是對於吉田松陰的研究，可謂是汗牛充棟。¹⁴然而，將三者做一體觀瞻的研究，在學界尚為少數，僅據筆者目力所及，只有王向遠（1962-）從文學層面考察了三人的「侵華迷夢」，但本研究的側重點則與之不同，主要從歷史與思想層面展開研究，並從長時段視角考察三人承上啟下的影響。¹⁵以下本文將探討和分析近松門左衛門、佐藤信淵和吉田松陰三人侵佔中國以及建構日式區域秩序的構想。

貳、明清鼎革與《國姓爺合戰》的內在關聯

在江戶幕府頒佈第五次鎖國令不久，中國大陸發生了明清鼎革之事，清人攻佔明都北京，並繼續追剿以南明為主的明朝餘部。對於中國大陸的變局，處於鎖國狀態的江戶幕府通過往來長崎的中國商人之口而得知。與此同時，南明勢力先後派遣使者向日本乞師，希望江戶幕府出兵以期實現復國的目標。

根據《華夷變態》、《日本乞師記》、《海東逸史》、《外蕃通書》、《海上見聞錄》、《臺灣鄭氏紀事》、《朱舜水文集》、《張斐筆語》等中日典籍記載，南明的各方勢力從一六四五年至一六八六年間至少

-
- 14 如有嚴紹盪：〈幕末的「宇內混同說」與明治時代的「大東合邦論」——近代日本的「國家主義」思潮研究〉，《日本學刊》，1997年第1期（1997年1月），頁83-95；李群：〈近松門文學中的武士道和侵華意識〉，《日本學刊》，2006年第1期（2006年1月），頁129-139；薛子奇、周彥：〈海外雄飛論——日本「大陸政策」的思想淵源〉，《北方論叢》，1997年第1期（1997年1月），頁59-62；稻雄次：《佐藤信淵の虚像と実像》（東京：岩田書院，2001年）；渡邊保：《近松物語：埋もれた時代物を読む》（東京：新潮社，2004年）；郭連友：《吉田松陰與近代中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年）；張崑將：〈吉田松陰《講孟餘話》的詮釋特質與其批判〉，《漢學研究》，第27卷第1期（2009年3月），頁207-233；神戶女子大学古典芸能研究センター（編）：《近松再発見：華やぎと哀しみ》（大阪：和泉書院，2010年）；須田努：《吉田松陰の時代》（東京：岩波書店，2017年）；奈良本辰也：《吉田松陰を語る》（東京：大和書房，2015年）等等。
- 15 王向遠：〈江戶時代日本民間文人學者的侵華迷夢——以近松門左衛門、佐藤信淵、吉田松陰為例〉，《重慶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年4期（2008年7月），頁120-124。

有二十餘次赴日乞師。¹⁶其中，《華夷變態》中記載的乞師次數多達五次，即：

(1) 一六四五年，南明唐王政權（1645-1646）的都督崔芝（一作周鶴芝，生卒年不詳）兩次遣使赴日乞師；

(2) 一六四六年，南明唐王政權的平虜伯鄭芝龍（1604-1661）遣使黃征明（1600-1660）分別向日本皇帝、上將軍、長崎王乞師；

(3) 一六四九年，南明魯王政權的建國公鄭彩（1605-1659）赴日本乞師；

(4) 一六五八年，鄭成功（1624-1662）遣使赴日乞師；

(5) 一六五八年，鄭成功之子鄭經（1642-1681）遣使赴日乞師。¹⁷繼之，在黃宗羲（1610-1695）的《日本乞師記》中亦記載了四次乞師：一六四六年三月，南明唐王政權水師都督周鶴芝（即崔芝）欲遣使赴日本薩摩乞師，但副都督黃斌卿（?-1649）以吳三桂（1608-1678）之事為由而反對，未能實現，直至一六四七年二月，周鶴芝才遣使赴日本薩摩藩乞師。不久，周鶴芝的義子林皋（生卒年不詳）又赴日本乞師。同年六月，御史馮京第（?-1654）等人赴日本長崎乞師。此後的一六四九年，南明魯王政權又派將軍阮美（生卒年不詳）赴日乞師。¹⁸

16 關於明人乞師日本的次數，中村久四郎指出，明人在明末清初先后向日乞師十七次、乞資六次，見氏著：〈明末の日本乞師及び乞資〉，《史学雜誌》，第26編第5號（1915年5月），頁7-23、〈明末の日本乞師及び乞資（第二回完結）〉，《史学雜誌》，第26編第6號（1915年6月），頁60-67。木宮泰彥在《中日交通史》中〈明末之乞師及乞資〉一節中，幾乎沿用了中村久四郎的說法，亦認為明末的乞師共達十七次之多（其中一次是間接乞師）。見氏著：《中日交通史（下）》，陳捷（譯）（上海：商務印書館，1931年），頁316-320。然而，隨著研究的深入，南明勢力向日本乞師的次數遠不止十七次，僅以朱舜水的乞師為例，中村久四郎和木宮泰彥的統計皆把朱舜水的赴日乞師作為一次乞師，而事實上朱舜水曾多次赴日乞師，並最終客居日本。同時，鄭經在鄭成功逝世後亦曾赴日乞師。是故，本文認為明人乞師的次數是超過十七次的。

17 林春勝、林信篤（編）：《華夷變態（上）》（東京：東方書店，1981年），頁11-13、15-19、25-30、45-48。

18 〔明〕黃宗羲：《日本乞師記》，收入沈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第2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頁180-183。

毋庸置疑，在赴日乞師過程中，以鄭芝龍、鄭成功父子為主的明鄭勢力至少十次向日本乞師，占乞師次數的一半以上，且由於鄭芝龍、鄭成功與日本的特殊親緣關係，¹⁹使鄭芝龍遣使黃征明赴日乞師之事引起了江戶幕府的重視。幕府將軍德川家光（1604-1651）召集大老井伊直孝（1590-1659），老中松平信綱（1596-1662）、酒井忠勝（1587-1662）、阿部忠秋（1602-1675）、堀田正盛（1609-1651）以及尾張、紀伊的納言、水戶中納言等人商討，家光等多數人皆主張答應鄭芝龍的乞師請求，強調出師對日本的利處：「異邦乞我救援，是本朝之榮。方今發天下亡命之士，得之數十萬，加以西國中州之兵，亦足以耀國家之威德於異域。」²⁰有學者從德川家光採用荷蘭新式武器裝備軍隊、學習鐵炮攻城之法以及居室屏風上所繪製的世界地圖等細節，證明家光出兵的意圖極為明顯，甚至稱之為「支那侵略的雄圖」。²¹然而，「幕府大老」井伊直孝則持堅決反對的態度，一方面，他認為「本邦困敝」而根本無力幫助明人出兵復國，另一方面，豐臣秀吉的前車之鑒未遠，出兵不利於日本。因此，在井伊直孝的強大影響力下，江戶幕府最終決定「不出師」，不久幕府得知明軍兵敗及鄭芝龍降清的消息，令長崎奉行轉告乞師使者日本因「福州之敗」而不及赴援，故返其獻物，使之歸國，婉拒了「乞師」的請求。此後，鄭成功亦多次向江戶日本乞師，幕府雖仍是拒絕，卻多次有償地資助了鳥銃、腰刀、角甲等大量武器，「其（鄭芝龍）子森官，猶奉明主，才保南隅，賜國姓號朱成功。屢與賊戰，互有勝負。每歲發船渡長崎，貨殖以厚軍備之利。」²²這些軍事物資對鄭軍的重要意義可想而知。

南明勢力持續二十餘年的赴日乞師最終以失敗告終，失敗的原因可謂

19 據載，鄭芝龍早年曾來日本，居住平戶多年，日人稱「平戶一官」，後娶田川氏為妻而生鄭成功。在平戶期間，鄭芝龍依附于海盜商人李旦門下，逐漸受到他的信任而成為得力助手。之後鄭芝龍離開日本在臺灣建立了一支強大的私人海軍而稱雄海上，後接受明朝的招撫。這意味著，日本平戶是鄭芝龍海上勢力的發跡之地。參見丸山正彥：《臺灣開創鄭成功》（東京：嵩山房，1895年）；岡田東寧：《臺灣歷史考》（東京：拓殖務省文書課，1897年）。

20 山田俊藏：《德川十五代記》，第4篇（東京：山田俊藏，1878年），卷之9，頁10。

21 辻善之助：《海外交通史話》（東京：內外書籍株式會社，1930年），頁652-653。

22 林鷲峰：〈吳鄭論〉，收入日野龍夫（編集、解說）：《鷲峰林學士文集》（東京：べりかん社，1997年），頁509。

是錯綜複雜，石原道博（1910-2010）曾指出，「南明各政權間的對立」、「乞師活動的無計畫、無組織」以及「乞師者被奸僧、奸商所利用」是乞師失敗的重要原因。²³雖然如此，但江戶日本對乞師者的拒絕並不等於其沒有「出兵」的意圖，幕府斷絕日明交通或禁止武器輸出等的行為，實際上只是表面文章，他們對明鄭勢力的暗中支持除了巨大的經濟利益外，更折射出江戶日本的侵略中國野心，只是這一「野心」未能予以實踐，以至於明治日本人常因江戶幕府錯失此次出兵中國的良機而「扼腕歎息」。

關鍵的是，在明鄭勢力滅亡後，一股「鄭成功熱」現象卻在江戶民間悄然興起。其中，近松門左衛門以《明清鬥記》為基礎而創作的淨琉璃歷史劇《國姓爺合戰》（原劇名為《國性爺合戰》）最具代表性和影響力。左衛門主要生活於江戶幕府統治逐漸趨於穩定的元祿時代，而以商人為主的町人勢力的興起更推動了「元祿文化」的盛行。²⁴《國姓爺合戰》正是在這一背景下問世，該劇主要敘述了生於日本的「國姓爺」回到中國之後打敗韃靼兵（清兵）、攻佔南京城、最終將韃靼人逐出國境的故事。很明顯，其中的「國姓爺」的原型就是鄭成功，但近松門左衛門的「國姓爺」卻沒有使用鄭成功的名字，而是虛構了日本名字「和藤內」。「和（わ）」即「日本」，「藤（とう）」諧音「唐（とう，意指中國）」，「內（ない）」意指「不是（ない）」，言外之意，「和藤內」既不是日本人，也不是中國人，而是中日的「混合」。表面上看，這一表述確實比較符合鄭成功的出身，但《國姓爺合戰》中卻有意將「和藤內」塑造成日本武士的形象，並在第二場中描繪了和藤內在海邊看到「鵝蚌相爭」而突然悟出了「兵法奧義」的場景，對此，左衛門緊接著寫道：

兩雄相鬥，趁虛而入，為兵法秘密〔……〕今父親一官的生國大明與韃靼正是鴨蛤（鵝蚌）之爭，我要馬上到唐土去，運用兵法

23 石原道博：《明末清初日本乞師の研究》（東京：富山房，1945年），頁122-123；韓東育：《從「脫儒」到「脫亞」：日本近世以來「去中心化」之思想過程》（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9年），頁168-172。

24 齋藤隆三：《江戶時代の風俗》，收入國史研究會（編）：《岩波講座日本歷史》，第7卷（東京：岩波書店，1934年），頁50-52。

策略而攻戰，一舉吞併大明、韃靼。²⁵

也就是說，「國姓爺」所做之事已完全不同於鄭成功的事實，其完全被「日本化」，代表日本人打敗了明和韃靼。

同時，左衛門在《國姓爺合戰》中更藉由和藤內之口反復說道「日本為神國」，並特別強調和藤內依靠日本母親給予他的虎首護符而得到了「天照大神」的保佑，使其在中國屠虎殺敵，擊敗韃靼人。²⁶這意味著，日本的血統使和藤內得到日本神靈的庇護，而日本武士精神又賦予了他忠誠、勇猛的品格，這兩方面的結合正是中國人所不具備的特性，由此折射出日本優於中國之處。尤為重要的是，左衛門不只借和藤內之口說出「發揚日本國威」的「豪言壯語」，更不時地凸顯出「佔領中國」的野心。在他的塑造下，「國姓爺」雖保留鄭成功的影子，但已被刻畫成日本打擊中國的急先鋒。《國姓爺合戰》已不只局限於江戶日本對「明末乞師」的「想像回應」，更暴露出其攻佔中國的野心，而這一野心顯然不是突然出現於江戶前期，它是江戶之前日本侵略中國野心的繼續，只不過是率先在文學領域表現出來，誠如有學者言道：

近松門的《國姓爺合戰》，是十八世紀初日本對華侵略擴張思想的一次暴露〔……〕是當時日本藝人借助戲劇這種文藝形式表達和宣洩侵華迷夢和幻想的典型例證。²⁷

據載，《國姓爺合戰》在日本連續公演了十七個月，盛況空前。²⁸這一「國姓爺熱」或「鄭成功熱」的現象，恰恰說明了該劇對鄭成功史事的改編完全迎合了江戶日本人的需求。江戶日本未能出兵中國的「憾意」在劇作家的筆下得到了「完美的彌補」，而左衛門的做法更喚醒了日本軍事打

25 近松門左衛門：《國姓爺合戰》，收入國民圖書株式會社（編）：《近松門左衛門集（下）》，《近代日本文學大系》，第7卷（東京：國民圖書株式會社，1928年），頁83。

26 近松門左衛門：《國姓爺合戰》，頁91-92。

27 李群：〈近松門文學中的武士道和侵華意識〉，頁137。

28 石原道博：《國姓爺》（東京：吉川弘文館，1986年），頁86。

擊中國而建構日式區域秩序的野心，《國姓爺合戰》從心理層面對日本民眾起到了重要的藉慰作用。因此，明治政府利用「鄭成功抗清」的事蹟發動對清戰爭和殖民臺灣的歷史遠因亦不難理解。關鍵的是，日本在侵佔臺灣後於一八九七年（明治三十年）將「延平郡王祠」改為「開山神社」，把鄭成功正式列入日本神祇。²⁹其用意顯然是利用臺灣人對鄭成功的認同而實施政治同化，以期從文化信仰層面鞏固日本對臺灣的統治，實現了江戶時期的侵華構想。所以，毋庸置疑的是，江戶日本的「鄭成功熱」為日本侵略中國的設想之一，即使它只停留在設想層面，但卻甚深地影響了日本歷史的進程。

參、江戶中後期的「西方滲透」與佐藤信淵的「宇內混同說」

繼《國姓爺合戰》之後，佐藤信淵的「宇內混同說」則是江戶日本建構日式區域秩序的又一設想。如果說，左衛門是通過文學創作的方式彰顯日本的侵華傾向，那麼，信淵則直接提出武力吞併中國的設想。從《國姓爺合戰》中的「模糊侵華意識」到信淵的「具體侵華方案」，除了二人所處的不同歷史時代之外，更與二人之間的江戶思想的走向密切相關。

信淵曾以「經世家」的身份著稱於江戶時代，然考察他的學術淵源，其為平田篤胤的弟子，而篤胤又是本居宣長的弟子，是故，「國學家」應是信淵的第一學術身份，後又兼習儒學、西學，使其思想學說集諸家之大成。³⁰然而，信淵生活的時代已經完全不同於左衛門的時代，江戶幕府處於內憂外患之中。由於元祿時期（1688-1703）商品經濟的高速發展，致使依靠「祿米」為生的武士階層日益貧困，從而使幕府和大名出現了嚴重的財政危機。對此，幕府將軍德川吉宗（1684-1751）發起「享保改革」，雖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財政危機，³¹但農村的土地兼併以及農民的沉重負擔並沒

29 瀨川光行：《日本之名勝》（東京：史傳編纂所，1900年），頁299。

30 野村兼太郎：《江戶時代の經世家》（東京：ダイヤモンド社，1942年），頁319-322。

31 文部省社會教育局（編）：《享保改革に於ける財政緊縮と社會教化》，《社會教育叢書》，第22輯（東京：文部省，1929年），頁1-12。

有解決，反而導致農村階級分化日益嚴重。因此，幕府將軍德川家齊（1773-1841）繼續進行改革，通過強制外出農民返鄉、設立「浮浪者收容所」、建立「義倉」、限制種植經濟作物等「重農」政策和頒佈儉約令、廢除債務、穩定物價和貨幣等「抑商」政策，試圖以「復古主義」的方式遏制商品經濟的發展，³²這一做法幾乎是無視實際情況，其結果自然是事與願違，尤其是農民的生活狀況未有太多改善，致使農民起義不斷發生，更進一步危及幕府的統治。

與此同時，西方勢力已開始向日本滲透。自一六四一年，江戶幕府頒佈第五次鎖國令之後，除了允許荷蘭可以在長崎通商之外，其他的西方國家全部被禁止。然而，由於西方資本主義的急劇發展而迫切需要海外市場，俄國、英國等國從一七九二年到一八二五年間多次來到日本，要求通商，但遭到幕府的拒絕。在此之前，俄國的勢力早已滲透至蝦夷地區，威脅日本的北方安全，而英美等國的軍艦亦時常出現在日本南部近海。³³針對外患，江戶日本的有識之士開始意識到海防的重要性。林子平（1738-1793）在天明五年（1785）著成的《三國通覽圖說》中，在介紹蝦夷、朝鮮和琉球三國的地理、風俗、物產的同時，特別強調三國對保護日本的重要性。緊接著，在天明六年（1786）完成的《海國兵談》中，林子平更是從水戰、陸戰、夜戰等層面詳細地提出了日本建立海防體系的武備設想。³⁴本多利明（1743-1821）在《經世秘策》和《西域物語》中亦強調加強海防的重要性，但與林子平不同的是，他的思想中已逐漸凸顯出對外擴張的戰略，其側重點已不局限於未納入日本領土的蝦夷之地，而是擴展至中國的東北地區（包括庫頁島）以及俄國勘察加半島等地，³⁵由此解決幕府的危機。

如果說，對外擴張思想只是在本多利明解決幕府危機的策略中初露端倪，那麼，信淵在應對幕府內憂外患的困境時則明確地提出了侵佔中國、稱霸世界的「宇內混同說」。在《宇內混同秘策》中，信淵制訂了周密的

32 吳廷璆：《日本史》（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94年），頁290-292。

33 足立栗園：《海國史談》（東京：中外商業新報商況社，1905年），頁310-317。

34 野村政夫：《海の日本と林子平》（東京：照林堂書店，1942年），頁131-173。

35 足立栗園：《近世日本國防論》，上卷（東京：三教書院，1939年），頁208-213。

戰略計畫：

第一步，征服中國東北（滿洲、韃靼），此為易取之弱地。從日本東北部北陸、奧羽、松前等地渡海至黑龍江，由此為據點南下取吉林、遼寧、蒙古諸地。

第二步，佔領朝鮮。與第一步戰略遙相呼應，由朝鮮進軍中國東北。

第三步，從琉球取臺灣，由臺灣直達浙江各地，佔領中國江南各地。

第四步，天皇御駕親征中國，佔領中國全境。³⁶

重要的是，信淵之所以底氣十足地提出這一完整「侵華設想」，是因為日本具備清國、朝鮮等其他國家不具備的優秀特性。是故，在《宇內混同秘策・混同大論》中首言：

皇大御國，大地最初成立之國，為世界萬國之根本。故若能經緯其根本之時，則全世界悉為其郡縣，萬國君長皆為其臣僕。謹稽神世之古典，所謂「所知青海原潮之八百重也」，即皇祖伊邪那岐大神之速須佐之男命所賜之事。然則明產靈之神教以安撫世界萬國之蒼生，乃最初皇國之主者所知之要務。³⁷

從中可知，作為「皇大御國」的日本，是天神創建的國家，故征服世界是天神賦予日本的神聖使命，亦是日本「當仁不讓」的責任。同時，信淵更借助西洋地理學闡述了日本地理位置的優越性，而這一優越的位置亦是得自於「天神」的「眷顧」：

日本自赤道以北三十度起至四十五度止，氣候溫和，土地肥沃，萬種物產無不滿溢。四周皆臨大洋，海船運漕極其便利。萬國無雙，人傑地靈，勇敢決絕，殊絕他邦。其形勝之勢，堂堂八表，

36 佐藤信淵：《混同秘策》，收入瀧本誠一（編）：《佐藤信淵家學全集》，中卷（東京：岩波書店，1926年），頁199-205。

37 佐藤信淵：《混同秘策》，頁195。

天然全備鞭撻宇內之實徵。³⁸

正因如此，日本應以神州的雄威，征服「蠻夷蠢類」，混同世界，統一萬國。

不難看出，信淵的征服中國、宇內混同的構想主要源自於日本「皇統」和「地理」的優越性，多數學者曾從他的「國學家」的身份論述其思想淵源，成為學界的主流觀點。然而，從長時段的歷史脈絡考察，從《國姓爺合戰》到「宇內混同秘策」的百余年間，江戶日本通過軍事打擊中國而建構日式區域秩序的構想雖一度沉寂，但這一期間恰是江戶日本思想家從「皇統」、「水土」以及「思想文化」層面建構「日本優越論」的重要時期。事實上，從明清鼎革伊始，它直接帶給江戶日本的反映是「華夷變態」的發生，即「夷狄（滿清）入主中原，華夏（明朝）淪為夷狄」，而乞師者為達到日本出師的目的，在乞師文書中不乏言過其實的讚美之詞，把日本解讀成「中華」，為日本「變夷為華」提供了巨大的輿論便利。在這一刺激下，江戶朱子學派、古學派、闇齋學派、水戶學派、國學派等思想家從「皇統優越論」和「水土優越論」入手，凸顯出日本優越中國之處。³⁹其中，山鹿素行（1622-1685）率先從「皇統」和「水土」兩個層面論證日本的優越性。在素行的視域內，他首先將《古事記》、《日本書紀》中「神代」的傳說「信史化」，明確指出日本是天神（伊弉諾尊、伊弉冊尊）創造的國家，而天皇「皇統」亦源自於天神，是故，日本的「皇統」既從未中斷，也無亂臣賊子「篡弒」之事的發生。關鍵的是，日本優越的「水土」亦是「天神」選擇的結果，正因如此，日本四周環海且遠離中國大陸，使其從未遭遇過外敵的入侵，即使曾有過「蒙古來襲」之事，也是以失敗告終。⁴⁰相反，中國大陸王朝的疆域雖廣闊，但卻被夷狄環繞，而不得不修築長城、要塞等來防備夷狄，既勞民傷財，又不能有效地抵禦匈奴契丹北虜，最終淪於夷狄之手。同時，中國王朝的「皇統」又經常中

38 佐藤信淵：《混同秘策》，頁195。

39 董灝智：〈江戶古學派的「日本優越」論〉，《史學月刊》，2017年第4期（2017年4月），頁129-133。

40 山鹿素行：《漢和中朝事實》（東京：大日本國民教育會，1912年），頁10-23。

斷，亂臣賊子的易姓之事不可勝數。由此素行得出結論：日本才是真正的「中華文明之土」、「中國」，是本朝，而日本以前所認同的中國王朝其實是外朝，並不是真正的中華、中國。除素行之外，古學派的伊藤仁齋（1627-1705）、荻生徂徠（1666-1728），闇齋學派的山崎闇齋（1619-1682）、淺見綱齋（1652-1712），國學派的本居宣長（1730-1801）等人亦在不同程度上通過「神國」、「神道」等思想來證明日本的優越性，而在西洋地圖傳入日本之後，西川如見（1648-1724）、杉田玄白（1733-1817）等人則利用西洋的地理學知識在素行「水土論」的基礎上進一步論證日本水土優越論。他們通過世界地圖及地球儀而意識到中國大陸與日本根本不是「中心」和「邊緣」的關係，「從支那之書，以其國為中土。夫地者一大球也，萬國配居焉，所居皆中也，何國為中土？支那亦東海一隅之小國也。」⁴¹由此解構了中國為中心的天下觀。西川如見則在《日本水土考》中，將天干地支的方位以及周易八卦的方位與世界地圖結合，指出，日本地處萬國的東部及東北部，為朝陽始照之地。若從八卦的方位、卦德及五行屬性來看，東方屬震位、木德，為萬物始出之地。東北方屬艮位、土德，象徵著「陰之終陽之始」之意。是故，日本之地草木茂盛，萬物生機勃勃，為水土優秀之地。這意味著，《古事記》、《日本書紀》等書中稱日本為「扶桑」、「豐葦原瑞穗國」、「日出之國」、「日神主於此」的傳統觀點並不是虛構的傳說，而是得到了新的證實。這一新的「水土論」對江戶思想家的天下觀及日本優越論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所以說，信淵在幕府危機時期接續了江戶「日本優越論」的大纛，並將其作為日本侵佔中國、建構日式區域秩序的理論基礎，從而使近松門左衛門等人借「鄭成功之事」而凸顯的侵華構想被進一步細化，客觀上接續了江戶前期的侵華構想。即使信淵對中國的認識即在後來的《存華挫狄論》中有所改觀，放棄了侵佔中國的設想，但他的「宇內混同說」對近代日本大陸政策和發動侵略戰爭影響巨大，無論是一八九四年的甲午戰爭還是一九三一年以來的全面侵華戰爭，很明顯都有《混同秘策》的影子：

41 杉田玄白：《狂醫之言》，收入沼田次郎、松村明、佐藤昌介（校注）：《洋學（上）》，《日本思想大系》，第64卷（東京：岩波書店，1976年），頁240。

《混同秘策》實為安政時代之前的今日我國之大陸政策，驚其以卓見喝破當世，因此，他的混同秘策不止言說其大陸經綸，更可看作是他的「戰爭論」，恐怕後來的「日本戰爭論」就確立於此時，其精神也在某種程度上被擴充。⁴²

肆、黑船事件與吉田松陰的「對外擴張論」

《混同秘策》並未能成為江戶幕府挽救危機的方案，相反，日本卻在歐美諸國的不斷滲透中被迫開國。一八五三年，美國海軍準將馬休·培里（Matthew Calbraith Perry, 1794-1858）率艦隊駛入日本江戶灣，向江戶幕府提出「開國」的要求，未能如願。一八五四年三月，佩里再次來到日本，德川幕府被迫與美國簽訂《日米和好條約》（通稱《神奈川條約》），⁴³日本的鎖國時代由此結束。

事實上，在「黑船事件」之前的鴉片戰爭已給鎖國的日本帶來了不小的震撼，⁴⁴尤其是清朝在鴉片戰爭中的敗北，不只引起了日本的有識之士的恐懼與焦慮，更擔心西方諸國會入侵日本，是故，「黑船事件」發生之後對幕末的日本人產生了強烈的刺激，使他們深刻意識到日本與美國的差距。面對日本內憂外患、危機四伏的局面，諸多知識人提出了變革主張，吉田松陰正是其中之一。吉田松陰生於幕末開國、卒於安政大獄。松陰早年曾拜佐久間象山（1811-1864）為師，深受其「開國論」的影響，促使他的思想因幕末危局而由早年的排斥洋學轉為師法歐美諸國，甚至萌生了赴歐美實地考察的想法，但因幕府的鎖國政策未能如願。然而，在美國培里艦隊叩關而至、迫使日本開國的過程中，松陰竟與金子重輔（1831-1855）登上「黑船」，希望培里准許二人隨艦前往美國，但被婉拒。⁴⁵松陰因此事而入獄近一年，之後其由「獄中囚禁」改為「家中軟禁」。無論是在獄中

42 塚田正之助：《總力戰の性格》（東京：十字屋書店，1941年），頁9。

43 中島端藏：《近世外交史》（東京：岡安平九郎，1891年），頁46-48。

44 王曉秋：〈鴉片戰爭對日本的影響〉，《世界歷史》，1990年第5期（1990年5月），頁92-100。

45 島田增平：《偉人史談第1編：吉田松陰》（東京：平凡社，1918年），頁28-29。

還是家中，松陰始終堅持講學，「松下村塾」由此名揚天下。他借助中國儒學經典，採用西學知識，講授其政治思想之主旨。在松陰看來，依靠幕府而改變國家現狀如同「癡人說夢」，如欲拯救日本只有依靠新的力量，以「開國」為手段而引進西學，藉此通過武力實現「尊王攘夷」的壯舉，進而改變國家積弱積貧的局面。

然令人驚訝的是，與松陰挽救日本危局的變革主張如影相隨的竟然是征服中國、稱霸亞洲的「對外擴張論」，這一計畫詳載於《幽囚錄》之內。《幽囚錄》為松陰因私登「黑船」而入萩野山獄時的獄中之作。透視《幽囚錄》，松陰在自序中直言道：

皇國君臨四方，天日之嗣永，與天壤無極者，安有一衰而不復盛哉？近年來，魯西亞、米利堅，駸駸來逼，而官吏苟且權宜處分，是豈永世無變哉！皇天眷祐吾邦，必將生英主哲辟，一變而復古之盛者。方是時察萬國之情態形勢，為之規畫經緯，按圖弄筆，空論高議者，固不得與幹此也。吾雖微賤亦皇國之民也，深知理勢所以然，義不忍顧惜身家默然坐視不思報皇恩也。⁴⁶

從中可知，松陰首要申明了日本為「皇國」的特性，而這一特性正是日本優越中國之處，此種取向在他的《講孟餘話》中亦有明顯的體現：「我邦上由天朝，下至列藩，襲千萬世而不絕，非漢土之可比。」⁴⁷其中，亦凸顯出松陰以「日本主體性」為主要的思想特性。⁴⁸顯然，松陰與信淵相似，繼承了江戶時代古學派、國學派的「日本優越論」，並將此作為立論之基。因此，他特別指出，由於「皇國」日本承蒙上天眷顧，即便是遭遇千年未有之變局，必有英明之主救民於水火，故其作為「皇國之民」亦提出挽救日本的構想：

46 吉田松陰：《幽囚錄》，收入山口縣教育會（編）：《吉田松陰全集》，第2卷（東京：大和書房，1973年），頁39-40。

47 吉田松陰：《講孟餘話》，收入山口縣教育會（編）：《吉田松陰全集》，第3卷（東京：大和書房，1972年），頁24-25。

48 張崑將：〈吉田松陰《講孟餘話》的詮釋特質與其批判〉，《漢學研究》，第27卷第1期（2009年3月），頁207-233。

今急修武備，艦略具礮略足，則宜開墾蝦夷，封建諸侯，乘間奪多加摸察加（今堪察加半島）、隩都加（今鄂霍次克），諭琉球朝覲，會同比內諸侯。責朝鮮納質奉貢，如古盛時。北割滿洲之地，南收臺灣、呂宋群島，漸示進取之勢。然後愛民養士慎守邊圉，則可謂善保國矣。⁴⁹

這意味著，松陰主張通過武力方式將日本四周的蝦夷、多加摸察加、隩都加、琉球、朝鮮、滿洲、臺灣、呂宋群島等其他國家的領地占為己有，並以日本古代天皇「驅使三韓」、「開墾蝦夷」的豐功偉績作為歷史依據，強調日本吞併朝鮮、蝦夷等地的可行性：

近世論輿地者，或曰非山東無以制天下也，是徒知平源以還衰世之跡，而不知古昔神聖雄略之由之。古昔神聖常存雄略，驅使三韓，開墾蝦夷，固有包括四夷併吞八荒之志，方是時非葡六合之中建京定畿不可也〔……〕。⁵⁰

而佔領這些土地的目的並不是單純的擴張，而是由此構築一道保護日本的「隔離牆」，在此之前，德川幕府曾以「鎖國」的方式建構了一道「隔離牆」，既是針對西洋勢力的威脅，又是防備清人的武力進攻，其效果明顯地強固了日本的安全性，⁵¹但這道「隔離牆」卻在歐美列強的打擊下瞬間「灰飛煙滅」，於是，松陰設計出了幾乎與歐美諸國搶佔海外殖民地相似的作法來構建新的「隔離牆」，進而有效地抵禦西方列強的侵擾。

更為重要的是，當松陰得知幕府與俄國、美國締結條約之後，其對外思想的征伐範圍直接擴展至中國大陸、印度等地：

今也，德川氏已同兩虜（俄、美）和親，不能由我絕之。我若絕之，乃是自失其信義。為今日計，莫如慎守疆域，嚴行條約，以

49 吉田松陰：《幽囚錄》，頁 54-55。

50 吉田松陰：《幽囚錄》，頁 48。

51 韓東育：〈日本對外戰爭的隱秘邏輯（1592-1945）〉，《中國社會科學》，2013 年第 4 期（2013 年 4 月），頁 180-203。

羈縻兩虜，乘間開墾蝦夷，收琉球，取朝鮮，拉滿洲，壓支那，君臨印度，以張進取之勢，以固退守之基，使神功未遂者得遂，豐國未果者得果。⁵²

若將松陰的對外征伐構想與信淵的擴張方案比對便會清楚地發現，信淵的構想主要針對中國，並將近松門左衛門等人的「模糊構想」逐漸具體化，但松陰所要通過武力方式而建構的日式區域秩序顯然不只包括琉球、朝鮮以及中國，更是將矛頭指向了印度，而這一「野心」幾乎與豐臣秀吉的「戰略計畫」一脈相承：「先取高麗國之八道，後取大明國四百余州、南蠻、切利支丹國，其外至於遠島。」⁵³換言之，松陰對外征伐構想不只是江戶時代近松門左衛門、佐藤信淵等人侵華構想的延續，更是繼承了江戶之前的日本征服中國之野心，並在挽救日本危局的過程中進一步爆發，成為日本知識人挽救危機的方案之一。

雖然，松陰雖因「安政大獄」而被幕府殺害，但其通過「松下村塾」來教授弟子進而宣傳其思想主張，使他的思想被弟子們所繼承、發揚並應用於改造國家的實踐之中。推動倒幕運動、明治維新等日本重大歷史事件發展的木戶孝允（1833-1877）、高杉晉作（1839-1867）、久阪玄瑞（1840-1864）、伊藤博文（1841-1909）、山縣有朋（1838-1922）、井上馨（1836-1915）等俊傑之輩，皆出自松陰門下，梁啟超（1873-1929）對此有極為客觀的評價：

日本維新之首功，西鄉乎？木戶乎？大久保乎？曰，唯唯否否。伊藤乎？大隈乎？井上乎？後藤乎？板垣乎？曰，唯唯否否。諸子皆以成為成者也。若以敗為成者，則吉田松陰其人是也。吉田諸先輩造其因，而明治諸元勳收其果。無因則無果，故吉田輩當為功首也〔……〕然松陰死後，舉國志士，風起水湧，卒傾幕

52 吉田松陰：〈久坂玄瑞に復する書〉，《丙辰幽室文稿》，收入山口縣教育會（編）：《吉田松陰全集》，第2卷，頁415。

53 大河內秀元：《朝鮮物語》，上卷（江戶：東都書林，1849年），頁2。

府，成維新，長門藩士最有力焉，皆松陰之門人也。⁵⁴

更為關鍵的是，松陰的對外構想亦被弟子們所承繼，並逐漸成為明治政府的對外方針，在這一邏輯脈絡下，明治政府在維新伊始針對中國、琉球、朝鮮的諸多作法雖看似白雲出岫，實則是有意為之，誠如有學者所言：

《幽囚錄》中所展現的松陰先生之對外雄略乃是黎明日本之大國策〔……〕其以我肇國之大精神、八紘一字之大理想、上古烈聖之皇謨國策為根本理念。⁵⁵

所以說，松陰對近代日本的影響可謂是至深且巨，被譽為明治維新的精神領袖及理論奠基者，改變了日本歷史的進程。

伍、結語

通過以上研究可知，近松門左衛門的《國姓爺合戰》雖為文學作品，但卻從文學層面彌補了德川幕府未能應「明乞師者」而出兵中國的憾意，而佐藤信淵的「宇內混同說」和吉田松陰的「對外擴張論」則是應對日本危機所提出的解決方案。表面上看，近松門左衛門、佐藤信淵和吉田松陰三人的師承、學術背景無太多關聯，但他們的「侵華構想」卻似一脈相承。重要的是，他們所提出的「侵華構想」顯然不是突然出現的，而是延續了江戶之前的日本人侵佔中國、建立日式區域秩序的行動與思想，並隨著江戶思想家所建構的「日本文化優越論」而被進一步放大。

不寧唯是，近松門左衛門、佐藤信淵和吉田松陰的侵華設想更甚深地影響了明治維新的對外策略。一般認為，明治元年（1868），明治天皇發表《五條御誓文》標誌著明治維新的開始。關鍵的是，在明治維新伊始，日本政府便暴露出其對外擴張的野心，將侵略的矛頭指向朝鮮、琉球以及

54 梁啟超：《自由書》，收入《梁啟超全集》，第1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頁337。

55 福本義亮：《下田に於ける吉田松陰》（東京：誠文堂新光社，1942年），頁133。

中國臺灣等地，具體事實如下：

(1) 明治二年至明治三年（1869-1870），日本在明治維新伊始，便多次派遣使者赴朝，試圖仿照西方國家與日本建立外交的方式而同朝鮮簽訂新式條約，以期打開朝鮮的國門，進而解構中朝的宗藩體系，但皆被朝鮮拒絕。⁵⁶

(2) 明治四年（1871），牡丹社事件爆發。日本藉口琉球人被臺灣原住民殺害之事，出兵臺灣，此為明治政府第一次對外用兵。⁵⁷

(3) 明治五年（1872），日本廢除琉球國王尚泰（1843-1901）的「國王」稱號，將琉球國降格為琉球藩。明治十二年（1879），日本吞併琉球，改「琉球藩」為「沖繩縣」。⁵⁸

(4) 明治八年（1875），江華島事件爆發。日本通過「炮艦外交」的方式打開朝鮮的國門，逼迫朝鮮與其簽訂了《日朝修好條規》（《江華條約》）。⁵⁹

(5) 明治十五年至明治十七年（1882-1884），日本借朝鮮發生「壬午軍亂」和「甲申政變」之機，出兵朝鮮。⁶⁰

(6) 明治二十七年（1894），日本發動甲午戰爭並擊敗中國，不只通過《馬關條約》解構了中朝的宗藩關係，更迫使中國割讓臺灣列島，進而顛覆了以中國為中心的東亞區域秩序。⁶¹

以往的研究常將明治維新作為日本以上行動的動力和原因，認為，日

56 信夫清三郎（編）：《日本外交史》，上冊，天津社會科學院日本問題研究所（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年），頁126。伊原澤周：《近代朝鮮的開港——以中美日三國關係為中心》（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頁68-71。

57 謝必震、胡新：《中琉關係史料與研究》（北京：海洋出版社，2010年），頁189-191。

58 本多淺次郎：《新撰日本帝國史》（東京：寶永館，1902年），頁134-137。

59 《日清韓條約要覽》（東京：義勇閣，1894年），頁23-26。

60 菊池謙讓：《近代朝鮮史》，上卷（東京：大陸研究所，1940年），頁555-564；《近代朝鮮史》，下卷（東京：大陸研究所，1940年），頁33-49。

61 董灝智：〈日本發動甲午戰爭的歷史遠因考察〉，《外國問題研究》，2017年第2期（2017年6月），頁37-50。

本通過明治維新走上了資本主義道路，其迫切需要海外市場，必須以對外戰爭為手段來解決問題，於是，將戰爭的矛頭指向朝鮮、琉球與中國。⁶²這一說法雖不無道理，但通過本文研究可知，日本的如上行動只不過是近松門左衛門、佐藤信淵和吉田松陰等人「侵華構想」的實踐而已，甚至可以說完成了豐臣秀吉「未竟的事業」，明治維新只是加快了其「侵華構想」的實現過程。同時，明治日本人對鄭成功「反清義士」形象的塑造以及誇大江戶時代的「源義經為成吉思汗」的說法，⁶³其背後所暗含「侵略中國」的用意已不言而喻。這意味著，明治政府的對外侵略亦是接續了江戶之前日本扭轉中日「落差」的軍事行動，換言之，明治日本在挽救國家危亡之際而實行維新過程中所凸顯出的對外侵略絕不是資本主義發展的結果，而是與近代之前的日本建構日式區域秩序的行動與思想緊密相連，所以說，近松門左衛門、佐藤信淵、吉田松陰為主的江戶——幕末的侵華思想雖只是停留在設想層面，但卻在日本歷史上扮演著承上啟下的重要角色，故對近代日本等相關問題的研究不能只局限於近代視角，更應該關注近代之前的日本走向，因為東亞地區的「前近代」與「近代」之間，本來就不存在明顯的歷史性中斷，這種分斷除了能留下人為切割的痕跡外，並無歷史價值和現實意義。◆

62 施亞英：〈中國的覺醒與甲午戰爭——中日甲午戰爭研究綜述〉，《世界歷史》，1994年第5期（1994年10月），頁122-128、140。

63 該傳說最早出現於江戶時代，後由旅日的德國植物學家菲力浦·弗蘭茲·馮·西博爾德（Philipp Franz von Siebold, 1796-1866）收錄於其著作中而流傳至歐洲。明治時期，留學於英國的日本人末松謙澄（1855-1920）以此為基礎而提出「義經為成吉思汗說」，試圖為日本侵佔中國提供合理依據。參見末松謙澄：《義經再興記》（東京：上田屋，1886年）。

◆ 責任編輯：郭雨穎

引用書目

古代文獻

作者不詳

1894 《日清韓條約要覽》（東京：義勇閣，1894年）。

〔南朝宋〕范曄

1965 《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

〔明〕黃宗羲

1986 《日本乞師記》，收入沈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第2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

〔日〕林春勝、林信篤（編）

1981 《華夷變態（上）》（東京：東方書店，1981年）。

〔日〕林鷲峰著，日野龍夫（編集、解說）

1997 《鷲峰林學士文集》（東京：ぺりかん社，1997年）。

〔日〕山鹿素行

1912 《漢和中朝事實》（東京：大日本國民教育會，1912年）。

〔日〕近松左衛門

1928 《國姓爺合戰》，收入國民圖書株式會社（編）：《近松門左衛門集（下）》，《近代日本文學大系》，第7卷（東京：國民圖書株式會社，1928年）。

〔日〕杉田玄白

1976 《狂醫之言》，收入沼田次郎、松村明、佐藤昌介（校注）：《洋學（上）》，《日本思想大系》，第64卷（東京：岩波書店，1976年）。

〔日〕佐藤信淵

1926 《混同秘策》，收入瀧本誠一（編）：《佐藤信淵家學全集》，中卷（東京：岩波書店，1926年）。

〔日〕吉田松陰

1972 《講孟餘話》，收入山口縣教育會（編）：《吉田松陰全集》，第3卷（東京：大和書房，1972年）。

1973a 《幽囚錄》，收入山口縣教育會（編）：《吉田松陰全集》，第2卷（東京：大和書房，1973年）。

1973b 《丙辰幽室文稿》，收入山口縣教育會（編）：《吉田松陰全集》，第2卷（東京：大和書房，1973年）。

〔日〕大河內秀元

1849 《朝鮮物語》，上卷（江戶：東都書林，1849年）。

近人文獻

山田俊藏 YAMADA, Shunzō

1878 《德川十五代記》，第4篇（東京：山田俊藏，1878年）。
Tokugawa Jūgodaiki, Vol.4 (Tokyo: Yamada Shunzō, 1878).

三笠保存會（編） MIKASA Preservation Society (eds.)

1930 《大日本海軍戰史談》（東京：三笠保存會，1930年）。
Dainippon Kaigun Senshidan (Tokyo: Mikasa Hozonkai, 1930).

中島端藏 NAKAJIMA, Tanzō

1891 《近世外交史》（東京：岡安平九郎，1891年）。
Kinsei Gaikōshi (Tokyo: Okayasu Heikurō, 1891).

丸山正彥 MARUYAMA, Masahiko

1895 《臺灣開創鄭成功》（東京：嵩山房，1895年）。
Taiwan Kaisō Tei Seikō (Tokyo: Sūzanbō, 1895).

文部省社會教育局（編） MONBUSHŌ Shakai Kyōikukyoku (ed.)

1929 《享保改革に於ける財政緊縮と社會教化》，收入《社會教育叢書》，第22輯（東京：文部省，1929年）。
Kyōhōkaikaku niokeru Zaisei Kinshuku to Shakai Kyōka, in *Shakai Kyōiku Sōsho*, Vol. 22 (Tokyo: Monbushō, 1929).

王輯五 WANG, Jiwu

1996 《中國日本交通史》（上海：上海書店，1996年）。
Zhongguo Riben Jiaotong Shi (Shanghai: Shanghai Books, 1996).

王曉秋 WANG, Xiaoqiu

1990 〈鴉片戰爭對日本的影響〉，《世界歷史》，1990年第5期（1990年5月），頁92-100。
“Yapian Zhanzheng dui Riben de Yingxiang,” *World History*, No. 5 (May, 1990), pp. 92-100.

王向遠 WANG, Xiangyuan

2008 〈江戶時代日本民間文人學者的侵華迷夢——以近松門左衛門、佐藤信淵、吉田松陰為例〉，《重慶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年4期（2008年7月），頁120-124。
“Jianghu Shidai Riben Minjian Wenren Xuezhе de Qinhuа Mimeng——yi Jinsongmen Zuoweimen, Zuoteng Xinyuan, Jitian Songyin weili,” *Journa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No. 4 (July, 2008), pp. 120-124.

- 中村久四郎 NAKAMURA, Kyūshirou
1915a 〈明末の日本乞師及び乞資〉，《史学雜誌》，第26編第5號（1915年5月），頁1-25。
“Minmatsu no Nihon Kisshi oyobi Kisshi,” *Shigaku Zasshi*, Vol. 26, No.5 (May, 1915), pp. 1-25.
- 1915b 〈明末の日本乞師及び乞資（第二回完結）〉，《史学雜誌》，第26編第6號（1915年6月），頁59-69。
“Minmatsu no Nihon Kisshi oyobi Kisshi (Dainikai Kanketsu),” *Shigaku Zasshi*, Vol. 26, No.6 (June, 1915), pp. 59-69.
- 木宮泰彦 KIMIYA, Yasuhiko
1931 《中日交通史（下）》，陳捷（譯）（上海：商務印書館，1931年）。
Zhong Ri Jiaotong Shi, Vol. 2, Jie Chen (trans.) (Shanghai: Commercial Press, 1931).
- 末松謙澄 SUEMATSU, Kenchō
1886 《義經再興記》（東京：上田屋，1886年）。
Yoshitsune Saikōki (Tokyo: Uedaya, 1886).
- 本多淺次郎 HONDA, Asajirō
1902 《新撰日本帝國史》（東京：寶永館，1902年）。
Shinsen Nihon Teikoku Shi (Tokyo: Hōeikan, 1902).
- 石原道博 ISHIHARA, Michihiro
1945 《明末清初日本乞師の研究》（東京：富山房，1945年）。
Minmatsu Shinsho Nihon Kisshi no Kenkyū (Tokyo: Fuzambo, 1945).
- 1989 《國姓爺》（東京：吉川弘文館，1989年）。
Kokusenya (Tokyo: Yoshikawa Kōbunkan, 1989).
- 衣斐鉞吉 EBI, Saikichi
1926 《東亞の形勢と日本の将来》，上卷（京都：立命館大學出版部，1926年）。
Tōa no Keisei to Nihon no Shōrai, Vol. 1 (Kyoto: Ritsumeikan University Press, 1926).
- 辻善之助 TSUJI, Zennosuke
1930 《海外交通史話》（東京：内外書籍株式會社，1930年）。
Kaigai Kōtsū Shiwa (Tokyo: Naigai Shoseki Kabushiki Kaisha, 1930).
- 西龜正夫 NISHIKI, Masao
1936 《織田豊臣時代》（東京：厚生閣書店，1936年）。
Oda Toyotomi Jidai (Tokyo: Kōseika Shoten, 1936).

- 伊原澤周 IHARA, Takushū
 2008 《近代朝鮮の開港——以中美日三國關係為中心》（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
Jindai Chaoxian de Kaigang: Yi Zhong Mei Ri Sanguo Guanxi wei Zhongxin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2008).
- 足立栗園 ADACHI, Ritsuen
 1905 《海國史談》（東京：中外商業新報商況社，1905年）。
Kaikoku Shidan (Tokyo: Chūgai Shōgyō Shinpō Shōkyōsha, 1905).
 1939 《近世日本國防論》，上卷（東京：三教書院，1939年）。
Kinsei Nihon Kokubōron, Vol. 1 (Tokyo: Sankyō Shoin, 1939).
- 李群 LI, Qun
 2006 〈近松門文學中的武士道和侵華意識〉，《日本學刊》，2006年第1期（2006年1月），頁129-139。
 “Jinsongmen Wenxue zhong de Wushidao han Qīnhua Yishi,” *Japanese Studies*, No. 1 (Jan., 2006), pp. 129-139.
- 岡田東寧 OKADA, Tōnei
 1897 《臺灣歷史考》（東京：拓殖務省文書課，1897年）。
Taiwan Rekishi Kō (Tokyo: Takushokumushō Bunshoka, 1897).
- 吳廷璆 WU, Tingqiu
 1994 《日本史》（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94年）。
Riben Shi (Tianjin: Nankai University Press, 1994).
- 武安隆 WU, Anlong
 1985 《遣唐使》（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
Qiantangshi (Harbin: Heilong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85).
- 武田萬里子 TAKEDA, Mariko
 2005 《鎖国と国境の成立》（東京：同成社，2005年）。
Sakoku to Kokkyō no Seiritsu (Tokyo: Dōseisha, 2005).
- 奈良本辰也 NARAMOTO, Tatsuya
 2015 《吉田松陰を語る》（東京：大和書房，2015年）。
Yoshida Shōin o Kataru (Tokyo: Yamato Shobō, 2015).
- 信夫清三郎（編） SHINOBU, Seizaburō (ed.)
 1980 《日本外交史》，上冊，天津社會科學院日本問題研究所（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年）。
Riben Waijiao Shi, Vol. 1, Institute of Japanese Studies, Tianji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trans.) (Beijing: Commercial Press, 1980).

施亞英 SHI, Yaying

1994 〈中國的覺醒與甲午戰爭——中日甲午戰爭研究綜述〉，《世界歷史》，1994年第5期（1994年10月），頁122-128、140。

“Zhongguo de Juexing yu Jiawu Zhanzheng: Zhong Ri Jiawu Zhanzheng Yanjiu Zongshu,” *World History*, No. 5 (Oct., 1994), pp. 122-128, 140.

神戸女子大学古典芸能研究センター（編） Research Center of Classic
Performing Arts, Kobe
Women’s University (eds.)

2010 《近松再発見：華やぎと哀しみ》（大阪：和泉書院，2010年）。

Chikamatsu Saihakken: Hanayagi to Kanashimi (Osaka: Izumi Shoin, 2010).

島田増平 SHIMADA, Masuhei

1918 《偉人史談第1編：吉田松陰》，（東京：平凡社，1918年）。
Ijin Shidan Dai 1 Hen: Yoshida Shōin (Tokyo: Heibonsha, 1918).

梁啟超 LIANG, Qichao

1999 《自由書》，收入《梁啟超全集》，第1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

Ziyou Shu, in *Liang Qichao Quanjī*, Vol. 1 (Beijing: Beijing Press, 1999).

野村兼太郎 NOMURA, Kanetarō

1942 《江戸時代の經世家》（東京：ダイヤモンド社，1942年）。
Edojidai no Keiseika (Tokyo: Daiyamondosha, 1942).

野村政夫 NOMURA, Masao

1942 《海の日本と林子平》（東京：照林堂書店，1942年）。

Kai no Nihon to Hayashi Shihei (Tokyo: Shorindō Shoten, 1942).

郭連友 GUO, Lianyou

2007 《吉田松陰與近代中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年）。

Jitian Songyin yu Jindai Zhongguo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 Press, 2007).

塚田正之助 TSUKADA, Masanosuke

1941 《總力戰の性格》（東京：十字屋書店，1941年）。

Sōryokusen no Seikaku (Tokyo: Jūjiya Shoten, 1941).

森克己 MORI, Katsumi

1955 《遣唐使》（東京：至文堂，1955年）。

Kentōshi (Tokyo: Sibundō, 1955).

張崑將 CHANG, Kun-chiang

2009 〈吉田松陰《講孟餘話》的詮釋特質與其批判〉，《漢學研究》，第27卷第1期（2009年3月），頁207-233。

“Jitian Songyin Jiang Mengyuhua de Quanshitezhi yu qi Pipan [Interpretative Characteristics of Yoshida Shoin’s *Jiang Mengyuhua* and Criticisms of It in the Late Tokugawa Period],” *Chinese Studies*, Vol. 27, No. 1 (Mar., 2009), pp. 207-233.

須田努 SUDA, Tsutomu

2017 《吉田松陰の時代》（東京：岩波書店，2017年）。

Yoshida Shōin no Jidai (Tokyo: Iwanami Shoten, 2017).

船曳建夫 FUNABIKI, Takeo

2007 《右であれ左であれ、わが祖国日本》（東京：PHP 研究所，2007年）。

Migideare Hidarideare, Waga Sokoku Nihon (Tokyo: PHP Kenkyūjo, 2007).

菊池謙讓 KIKUCHI, Kenjō

1940 《近代朝鮮史》（東京：大陸研究所，1940年）。

Kindai Chosenshi (Tokyo: Tairiku Kenkyūjo, 1940).

渡邊保 WATANABE, Tamotsu

2004 《近松物語：埋もれた時代物を読む》（東京：新潮社，2004年）。

Chikamatsu Monogatari: Umoreta Jidaimono o Yomu (Tokyo: Shinchōsha, 2004).

福本義亮 FUKUMOTO, Giryō

1942 《下田に於ける吉田松陰》（東京：誠文堂新光社，1942年）。

Shimoda niokeru Yoshida Shōin (Tokyo: Seibundō Shinkōsha, 1942).

董灝智 DONG, Haozhi

2017a 〈五至九世紀日本構建區域秩序的嘗試〉，《世界歷史》，2017年第1期（2017年2月），頁84-93。

“Wu zhi Jiu Shiji Riben Goujian Quyuzhixu de Changshi,” *World History*, No. 1 (Feb., 2017), pp. 84-93.

2017b 〈江戸古學派的「日本優越」論〉，《史學月刊》，2017年第4期（2017年4月），頁129-133。

“Jianghu Guxuepai de ‘Ribn Youyuelun’,” *Journal of Historical Science*, No. 4 (Apr., 2017), pp. 129-133.

2017c 〈日本發動甲午戰爭的歷史遠因考察〉，《外國問題研究》，

- 2017 年第 2 期（2017 年 6 月），頁 37-50。
 “Riben Fadong Jiawu Zhanzheng de Lishi Yuanyin Kaocha,”
Journal of Foreign Studies, No. 2 (June, 2017), pp. 37-50.
- 德富豬一郎 TOKUTOMI, Ichirō
 1935 《近世日本國民史：豐臣氏時代・丁篇・朝鮮役・上卷》（東京：民友社，1935 年）。
Kinsei Nihon Kokuminshi: Toyotomishijidai · Chōhen · Chōsenyaku, Vol.1 (Tokyo: Minyūsha, 1935).
- 稻雄次 INE, Yūji
 2001 《佐藤信淵の虚像と実像》（東京：岩田書院，2001 年）。
Satō Nobuhiro no Kyojō to Jitsuzō (Tokyo: Iwata Shoin, 2001).
- 齋藤隆三 SAITŌ, Ryuzō
 1934 《江戸時代の風俗》，收入國史研究會（編）：《岩波講座日本歷史》，第 7 卷（東京：岩波書店，1934 年）。
Edo Jidai no Fūzoku in Kokushi Kenkyūkai (eds.), *Iwanami Kōza Nihon Rekishi*, Vol. 7 (Tokyo: Iwanami Shoten, 1934).
- 薛子奇、周彥 XUE, Ziqi & ZHOU, Yan
 1997 〈海外雄飛論——日本「大陸政策」的思想淵源〉，《北方論叢》，1997 年第 1 期（1997 年 1 月），頁 59-62。
 “Haiwai Xiongfeilun——Ribei “Dalu Zhengce” de Sixiang Yuanyuan,” *The Northern Forum*, No. 1 (Jan., 1997), pp. 59-62.
- 謝必震、胡新 XIE, Bizhen & HU, Xin
 2010 《中琉關係史料與研究》（北京：海洋出版社，2010 年）。
Zhong Liu Guanxi Shiliao yu Yanjiu (Beijing: Ocean Press, 2010).
- 韓東育 HAN, Dongyu
 2009 《從「脫儒」到「脫亞」：日本近世以來「去中心化」之思想過程》（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9 年）。
Cong “Tuoru” dao “Tuoya”: Ribei Jinshi Yilai “Quzhongxinhua” zhi Sixiang Guocheng (Taipei: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ess, 2009).
- 2013 〈日本對外戰爭的隱秘邏輯（1592-1945）〉，《中國社會科學》，2013 年第 4 期（2013 年 4 月），頁 180-203。
 “Ribei Duiwai Zhanzheng de Yinmi Luoji (1592-1945),”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No. 4 (Apr., 2013), pp.180-203.
- 2016 《從「請封」到「自封」：日本中世以來「自中心化」之行動過程》（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6 年）。
Cong “Qingfeng” dao “Zifeng”: Ribei Zhongshi Yilai “Zizhongxinhua” zhi Xingdong Guocheng (Taipei: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ess, 2016).

- 瀨野馬熊 SENO, Umakuma
1927 《朝鮮史大系・近世史》（東京：朝鮮史學會，1927年）。
Chōsenshi Taikai · Kinseishi (Tokyo: Chōsenshi Gakkai, 1927).
- 瀨川光行 SEGAWA, Mitsuyuki
1900 《日本之名勝》（東京：史傳編纂所，1900年）。
Nihon no Meishō (Tokyo: Siden Hensanjo, 1900).
- 嚴紹璽 YEN, Shaodang
1997 〈幕末的「宇內混同說」與明治時代的「大東合邦論」——近代日本的「國家主義」思潮研究〉，《日本學刊》，1997年第1期（1997年1月），頁83-95。
“Mumo de ‘Yunei Huntongshuō’ yu Mingzhi Shidai de ‘Dadong Hebanglun’——Jindai Riben de ‘Guojia Zhuyi’ Sichao Yanjiu,” *Japanese Studies*, No. 1 (Jan., 1997), pp. 83-95.